

# 大陆时期成舍我新闻自由思想的变迁探析

谢清果 王小贝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追求新闻自由是成舍我新闻实践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成舍我在大陆期间, 其新闻自由思想随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个人办报实践的进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因此文章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其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变迁, 从而能够对成舍我的新闻活动及其新闻思想形成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关键词:** 成舍我; 新闻自由思想; 大陆时期; 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 G21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346(2014)04-0080-06

成舍我, 湖南湘乡籍人, 1898年出生于南京, 自15岁踏入新闻业, 98岁时仍主持创办台湾《立报》, 直至1991年因病去世, 成舍我将一生奉献于新闻实践。纵观学者对于成舍我新闻思想的研究, 可基本确认追求新闻自由是其新闻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例如, 陈英程认为成舍我的办报理念主要有大众化、小报精编、不党不偏及言论与资本分离, 而统领其办报理念的价值观是尊重大众利益、追求言论自由和勤俭节约。袁玮指出成舍我的办报宗旨是为社会大众说话。<sup>[1]</sup> 刘艳凤将成舍我的新闻思想总结为坚持独立办报, 追求新闻自由, 主张新闻事业企业化经营和集团化发展。<sup>[2]</sup> 杨琦认为成舍我的新闻思想包括要求新闻自由、报纸应反映社会舆论并超然于党派之外及实现大众化。<sup>[3]</sup>

当前针对其新闻自由思想的研究, 又可大致分为以下两部分: 一是从结构上考察其新闻自由思想的源头, 尤其是自由主义对其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如: 张育仁在《自由的历险——

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中认为, 成舍我是一个“顽固的世界主义者”, “他从最初投身新闻事业开始, 就是怀抱一种思想和价值信念的, 这种名为‘世界主义’的价值信念的内核其实就是自由主义。”<sup>[4]</sup> 成露茜也探讨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对成舍我新闻活动的影响, 其中之一便是影响着他对独立性和新闻自由的追求。<sup>[5]</sup> 二是探索其新闻自由思想的具体内涵。如: 袁玮认为成舍我的新闻自由思想包括报纸应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政府应撤销新闻检查制度等。<sup>[1]</sup> 刘艳凤则将其概括为主张报纸在政治、经济、编辑及发行上实现独立。<sup>[2]</sup>

成舍我从未停止对新闻自由的追求, 其新闻自由思想亦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新闻实践而有所发展与变化。大陆阶段是成舍我办报活动的辉煌时期, 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更为系统地梳理成舍我在大陆时期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变迁, 以期对其形成、发展和演变有更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收稿日期: 2014-03-30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台湾新闻自由与两岸传媒交流合作研究》、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闽台传媒特区与两岸政治互信研究》(2013A035)成果。

作者简介: 谢清果, 男,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王小贝, 男, 山东潍坊人,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研究生。

一、孕育阶段（1913—1923年）：实践与主义的双重影响

1913年起，成舍我开始为《民岩报》撰稿，之后相继在《健报》、《民国日报》及《益世报》担任编辑。在1924年独立创办《世界日报》之前，成舍我早期的新闻实践及在此期间所接触的自由主义思潮，共同孕育了其新闻自由思想的萌芽。

民国初期曾一度建立起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及军阀混战，新闻自由遭到践踏。在恶劣的新闻环境下，成舍我多次因争取言论自由而惹祸上身。在1917年“南社事件”中，成舍我认为南社创办人柳亚子随意开除异见者的行为损害了他人的言论自由，反抗未果后，不惜辞去《民国日报》的职务，并主动退出“南社”。“这是成舍我为维护正义敢向名人挑战的初次行动。”<sup>[6]</sup>对此有学者认为，“此时言论自由观念已经开始在他身上生根发芽。”<sup>[7]</sup>1919年5月23日，成舍我因在《益世报》发表评论《安福与强盗》导致该报被封三天。1923年他又因不满《益世报》主管为讨好军阀而擅自删改社论而辞职。

如果说捍卫言论自由的实践为成舍我的新闻自由思想提供了扎根的土壤，那么对自由主义思潮的接触便为其提供了灌溉源泉，使之由自发走向自觉。

1918年，成舍我进入北大求学。此时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兼容并包、自由思想之风盛行。“成舍我与无政府主义产生联系首先是源于当时北大的两份刊物，《北京大学日刊》与《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而这两份刊物都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办的，因此首先对成舍我思想造成影响的是蔡元培。”<sup>[8]</sup>同时，“成舍我还是最早得到蔡元培赞助从事‘新思潮’译介的北大学生。”<sup>[4]</sup>蔡元培正是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作为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代表人物之一，对于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的观点也是大力宣扬。<sup>[8]</sup>在蔡元培的影响下，成舍我逐渐接触并接纳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北大求学期间，成舍我亦担任《益世报》编辑，在工作中结识了张东荪、李石

曾、吴稚晖等自由主义者。其中，吴稚晖是温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张东荪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李石曾则主张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分支和不同派别，追求个性、独立和自由是它们最主要的思想内涵。这也是成舍我后来一直秉承和追求的自由主义新闻理想的根源和内涵所在。”<sup>[9]</sup>

若说在早期的新闻实践中，成舍我的新闻自由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那么在走上自主办报的道路后，随着自身办报理念的逐渐形成，其新闻自由思想也更为成熟。

二、发展阶段（1924—1937年）：在自主办报的实践中走向成熟

1924年成舍我在北平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世界晚报》，次年又创办《世界日报》与《世界画报》，1928年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5年在上海创办《立报》。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创办的世界报系及《立报》相继停刊，在这十余年间（尤其是内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严格的新闻管制，通过建立官办新闻宣传系统、制定新闻法规甚至运用特务等非法手段控制新闻界。成舍我亦多次因追求新闻自由而遭迫害。1926年，《世界晚报》刊登了林白水被害消息，成舍我因此被张宗昌逮捕，险些遇害。1934年，成舍我又因《民生报》揭发彭学沛贪污案而被拘禁40天，《民生报》永久停刊。

成舍我自主办报的实践与其新闻自由观互相作用与影响。一方面，对新闻自由的追求统领着其办报方针。成舍我始终坚持政治、经济独立，拒绝接受津贴，为做到超党派甚至主动退出国民党，可以说其自主办报的过程也是为实现新闻自由而斗争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自主办报及1930年对西方报业的考察，他对如何处理好报业与政府、资本及公众的关系以真正实现新闻自由，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其新闻自由思想因此更具操作性。因此从1924年到1937年，这是成舍我新闻自由思想趋于成熟的阶段。具体而言，这一时期成舍我的新闻自由

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一) 新闻自由与政治

第一，坚持政府不应干涉报业。成舍我认为，报纸要实现“为社会大众说话”，就需撤销新闻检查制度，政府只需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而不应干涉报业的新闻活动。“言论出版两大自由应受国家根本法绝对的保护，各国政府不得任意制定有妨新闻界发展之法律或条例，应保障新闻界之绝对独立，不受任何外力之支配。”<sup>[10]</sup> 考察西方报业归来后，西方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给成舍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欧美的民营报纸其言论“完全是受民意的支配，可以自由批评政界，因此，广受民众欢迎，盈利巨万。”<sup>[4]</sup> 对比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新闻界的残酷管制，他感慨道：“罗氏以报纸不能极陈其过失为憾，以视吾国当局，惟箝制报纸，不使有所非议者，人之度量相越，何以至此极耶？”<sup>[11]</sup>

第二，坚持报业应超然无党派。成舍我认为“新闻记者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个人利益或营业的利益。”<sup>[12]</sup> 在成舍我看来，要真正实现新闻自由，报业便应保持政治上的独立，不依附任何政党，否则便会沦为政党的舆论工具。1927 年，当时还是国民党党员的成舍我以“办报不应受到任何党派之约束”为由，决定“自动放弃党籍”。

(二) 新闻自由与资本：报业应经济独立，拒绝接受政府及资本家投资

向媒体发放津贴是当时国民党政府间接控制舆论的重要方式。许多民营报纸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出卖新闻自由而接受经济补助。成舍我认识到经济独立是实现新闻自由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办的所有报纸共有的宗旨之一就是“不受津贴”，<sup>[13]</sup> 主要依靠大众化的经营方式，通过刊登广告来获利。正是经济上的独立，使成舍我所创办的报纸有底气自由地针砭时弊。

但经济上的独立依然无法使报业完全摆脱资本对新闻自由的侵蚀。1930 年考察欧美报业归来后，成舍我敏锐地指出西方报业大众化带

来的弊端，即“报纸大众化已被许多资本主义者利用做了种种的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sup>[14]</sup> 在资本家控股下的报纸虽然资本雄厚，无需依赖政府扶持，却无法真正维护公众利益，新闻自由也异化为黄色新闻的保护伞。因此，成舍我对报社投资者的资格加以限制，避免使所有权落入大资本家手中，提出“(报纸)可私人经营，但其资本，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长以至工人，均为主权者，均有分担报馆责任分享报馆利益之权，非工作人员不得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屏除之列。”<sup>[12]</sup>

(三) 新闻自由与公众：新闻自由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维护公众利益为价值取向。

言论自由的权力主体是广大公众。公众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将言论自由权部分过度给媒体，赋予媒体新闻自由权。可以说，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实现必然要求媒体拥有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权的行使最终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成舍我认可新闻自由这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点，明确表示他创办的报纸是为公众说话、维护公众利益的。“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公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sup>[15]</sup> 因此，虽然成舍我认为“报纸不需要资本，由各种观点看来，也不能不相当的商业化”，<sup>[12]</sup> 但其最终目标“不是如一般性商业型报馆主那样去掠取巨额盈利为自己所有，而是利用报纸大众化来实现自己办报的崇高社会目标，完成自己办报的社会责任。”<sup>[16]</sup> 可见，成舍我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始终是以维护公众利益为价值导向的，否则便不会提醒国内报业同仁不要重蹈西方黄色报纸的覆辙，并制定一系列措施以保障公众对报纸的监督权，防止报业因滥用新闻自由而损害公众利益。例如，他将确定报纸言论方针的权力赋予公众：“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有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

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sup>[12]</sup> 1933年9月，《世界日报》登出启事，要求读者对其实行监督检举，检举的内容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送报有无迟送或漏送的现象；二是订阅的报纸出现漏送，相关部门是否迅速给以答复和解决；三是订报、登广告等任何款项收支方面，有无舞弊；四是报务人员对待顾主有无傲慢无礼；五是对于报纸有何建议。此外，成舍我常常开展读者调查，搜集读者意见以改进报纸工作。<sup>[17]</sup>

三、在传承中变化（1937—1949年）：改变对待政府、资本的态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世界报系和《立报》相继停刊。战乱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但成舍我并没有放弃新闻事业。1938年4月《立报》在香港复刊，1945年《世界日报》重庆版、北平版及《世界晚报》相继复刊。

在此期间，成舍我的新闻自由思想在传承有所变化。在成舍我对新闻事业的新设想“资本家出钱，专门家办报，老百姓说话，政府认真扶持，依法管理”<sup>[18]</sup>中，依然延续了“维护公共利益”的指导思想，但对新闻自由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成舍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一）不再拒绝资本家投资，融资渠道对其开放

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报纸之将来》一文中，成舍我提出要拒绝非报社员工的投资，从而使资本家无法染指报业所有权，以此减少资本对新闻自由的妨害。为何此时又转而提倡“资本家出钱”呢？对此成舍我解释道：“因为二十年前还是文人办报时代，只要你能经常写几篇动人的文章，访几条出奇的特讯，威武不屈，艰苦有恒，就可以获得读者赞赏，使报纸日趋发达。那时不仅不需要一小时印二三十万份的转轮机，就连一小时印一千二三百份的平版机，也尽可无庸自备……战后中国报纸，此

种因陋就简的情况难再存在，就在抗战前二三年，全国各大都市报纸没有转轮机及若干新式设备的也多已纷被打倒。”<sup>[18]</sup>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竞争的激烈，购买昂贵的设备成为报社生存之必需，这无疑使资本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仅靠报社内部工作人员的投资已无法满足报业竞争的需要，更不必说实现成舍我的报业托拉斯之梦了。此时成舍我对资本的态度更为开放，由“其资本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屏除之列”转变为“新闻事业自然不能不欢迎有钱出钱……我们第一个原则，应该不拒绝资本家向新闻事业投资”<sup>[18]</sup> 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成舍我早已吸取西方大众化报纸发展过程中“少数资本家打着‘代表舆论’的旗帜，实行其自私自利勾当”的教训，因此，他将“老百姓说话”作为“我所建议新制度中最重要一点，核心之核心所在”，强调“要将资本家投资所得的利益和报纸所代表的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完全分开”<sup>[18]</sup> 通过编营分离的方式来维护新闻自由。为防止资本家对报纸言论的干涉，还规定“每一报馆必须组织一编辑委员会，委员会人选除三分之一得由投资主办报馆者自由延聘外，其余三分之二则应依一定比例，由学术机构、公共法团、读者代表分别选派。编辑委员会一经成立，则凡主笔总编辑之任免，报馆言论政策之制定，及对每一重大事件发生时采取之态度，即悉应由其决定，主办报馆者无权干涉。此委员会既有三分之二多数，出自人民选派，则报馆言论记载，亦即自可真正与老百姓意旨相配合。以资本家个人利益及意志支配报纸言论及所谓黄色新闻之流弊，亦从此可望避免。”<sup>[18]</sup>

（二）主张政府适度干预，不再将新闻自由与政府管制相对立

在新闻自由与政府干涉之间的关系上，成舍我的态度由追求独立办报变为希望政府“认真扶持，依法管理”。这种转变既受此时成舍我自身政治倾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特殊的时代

背景促使成舍我重新思考报业与政府的关系。

首先,成舍我自身政治倾向的变化使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有所缓和。“抗战时期,毕竟还是曾经对抗过汪清卫的成舍我与国民党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新时期。这期间,成舍我先是在汉口陈诚的军务会政治部担任设计委员,后被蒋介石指派为国民参政员,并曾拜会过陈布雷。在香港创刊《立报》,也曾获得陈诚、李书华的资助,并与王云五、傅传霖、陶百川、陈训畬等过往甚密,参与过国民党购买《星岛日报》、改组金钟华主持的编辑部的过程。1941 年冬,日本占领香港后停刊。虽然他拒绝了出任《扫荡报》社长,但在 1948 年,他接受了北平市立委候选人提名并顺利当选。”<sup>[19]</sup>可见,随着成舍我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其政治立场也愈来愈倾向于支持国民党政府,所主持的报纸亦渐渐无法坚持他曾倡导的“超党派”原则。“成舍我的报道愈来愈不能客观,不能超然,《世界日报》的时评和新闻在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倾向性上表现愈来愈明显,比如《世界日报》曾发表过《请共产党想一想》、《中共首都已告崩陷 国军昨日进驻延安》的报道,在蒋介石当选大总统后曾发表《为天下得人庆》的消息,《世界日报》的言论立场越来越倾向于国民党政府。”<sup>[10]</sup>因此,出于对国民党政府的信赖,成舍我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舆论操控亦不再一概拒绝。

另一方面,“成舍我对于政治巨魔态度的转变,自然要放在抗战的脉络与情境之中理解。事实上,抗战时期的中国报人,普遍都有一个为国家自由让渡新闻自由、同时希望政府依法管理的转变,成舍我无非言表了这一共同心声。”<sup>[19]</sup>根据德弗勒的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媒介系统在不同社会中具有不同的生存依赖关系,社会的变迁冲突越剧烈,大众媒介对社会的功能就越重要,社会对媒介的依赖也就越大。<sup>[20]</sup>全面抗战以来,报纸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正如成舍我所言:“要建国,心理建设其重要实超过于物质……建国必先建报,也正是这个意思。”<sup>[21]</sup>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政府有必要加强对

媒体的管理与扶持。此时,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成舍我承认新闻检查制度的合理性:“当一个国家受到空前灾难,为维护整个国家生存起见,新闻检查也就有她暂时不得已存在的意义,即为争国家自由,不得不牺牲个人的自由。”<sup>[22]</sup>同时,他也认识到媒介与政府并不是天然的对立关系,只要政府的管制尊重新闻规律,那么不但不会损害新闻自由,还将为新闻自由提供法律保障。“只要报馆的言论权真能由人民掌握,不至为少数特具野心者操纵败坏,则国家消极的管制与积极的扶助其唯一目的无非促进新闻事业之发展”。<sup>[18]</sup>

总之,此时成舍我主张报纸与政府应建立一种新型的、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这是因为“在过去打倒军阀时期,以军阀政府为对象,报馆与政府立于敌对地位……今军阀政府既早经打倒,尤其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与报馆均同负建国重任,双方正惟有相需相倚,竭诚合作,完成建国大业”。<sup>[18]</sup>

#### 四、余论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成舍我离开大陆,于 1951 年在香港相继创办《自由人》半月刊及《报学》半年刊。1952 年,成舍我前往台湾。在 1988 年台湾解除报禁之前,成舍我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新闻教育事业中,直至 1988 年台湾报禁解除才得以创办《台湾立报》。在此期间他仍多次撰文呼吁新闻自由。如 1958 年在《文星》杂志发表《狗年谈新闻自由》:“所谓决万几于公论,协国民之同心,一上下之议论,无一不是尊重新闻自由的表现。”1955 年,时任立法委员的成舍我向“行政院”提出一份洋洋洒洒的质询——《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针对 1952 年台湾内政部公布的《出版法施行细则》中两项重大侵害言论自由的规定提出质询,引起舆论轰动。“据《自由人》杂志唐煌年的报导说:‘那次四十五分钟的质询,会场肃静的空气和着一阵一阵的掌声,一段一段的叹息与喝彩声。’”<sup>[23]</sup>

成舍我投身新闻事业七十余年,始终秉持

独立精神，为促进中国报纸进步及争取新闻自由奋斗不懈，并被誉为中国现代新闻纸史上—勇毅斗士。<sup>[24]</sup>成舍我一生为人权保障和新闻自由而战，在实践中不曾停止思索新闻自由与社会政治、经济及公众的关系，在社会变迁中不断

调整自身的新闻自由观，以寻求实现新闻自由的最佳途径。纵观其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变迁，时代的烙印处处可见，不曾改变的是他始终将新闻自由置于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用一生的新闻实践来追求和捍卫。

#### 参考文献：

- [1]袁玮.成舍我的办报实践和办报思想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1.
- [2]刘艳凤.试论成舍我的新闻思想及其新闻实践[J].国际新闻界,2010,(8).
- [3]杨琦.成舍我的报刊活动思想探析[J].新西部,2008,(11).
- [4]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20.
- [5]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实践:成舍我的“非资本主义大众化报刊”[J].新闻学研究,2011,(106).
- [6]张晓锋.成舍我与南社内杠[J].传媒观察,2011,(3).
- [7]张晓锋.成舍我早期的实践活动与新闻精神孕育[EB/OL].(2010-10-01)[2014-03-07].[http://csw.shu.edu.tw/PUBLIC/view\\_01.php3?main=NEWS&id=1271](http://csw.shu.edu.tw/PUBLIC/view_01.php3?main=NEWS&id=1271).
- [8]湛畅.成舍我新闻教育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0:17.
- [9]谢平.办报办学,舍我其谁:成舍我与他的办报生涯[J].新闻与写作,2009,(4).
- [10]成舍我.如何防止不正确新闻之传布:敬告国际新闻会议及中国出席代表[J].民生报,1933,(9).
- [11]成舍我.罗斯福欢迎报纸指责政府:报学琐谈之六[N].世界日报,1934-01-11.
- [12]李磊.报人成舍我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23.
- [13]都海虹,赵卓伦.成舍我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J].新闻爱好者,2009,(24).
- [14]成舍我.我们的宣言[N].立报,1935-09-09.
- [15]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62.
- [16]李磊.成舍我“二元化”办报思想初探[J].现代传播,2009,(5).
- [17]谢一菲,章凤珍,任绍威.立足大众 重视管理:浅谈成舍我的报业经营理念[J].今传媒,2010,(12).
- [18]成舍我.报纸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J].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3,(2).
- [19]曹立新.成舍我方案[J].中华传播学刊,2012,(12).
- [20]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35.
- [21]成舍我.我们这个时代的报人[N].世界日报,1945-11-20.
- [22]成舍我.新闻检查仅因对外而存在[N].世界日报,1937-03-11.
- [23]李筱峰.成舍我与台湾民主运动: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来台知识分子的一个个案[EB/OL].(2005-03-13)[2012-05-19].  
[http://csw.shu.edu.tw/PUBLIC/view\\_01.php3?main=&id=103](http://csw.shu.edu.tw/PUBLIC/view_01.php3?main=&id=103).
- [24]吴相湘.风云际会下的书生:中国近现代二十七位学人列传[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500.

[责任编辑:杜嵩泉]